

上海市历史学会 编

上海史学名家 印象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历史学会 编

上海史学名家 印象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史学名家印象记/上海市历史学会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1160 - 8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史学家—生平事迹—上
海市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1720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傅惟本

上海史学名家印象记

上海市历史学会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348,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160 - 8/K · 1953

定价 48.00 元

出版说明

2012年是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六十周年。

上海市历史学会于1949年12月筹备,名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1952年1月正式成立,名为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1961年2月改名上海历史学会,1979年5月定名上海市历史学会。

上海市历史学会自成立以来,汇集了周谷城、李亚农、李平心、谭其骧等众多著名历史学家,他们活跃在历史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成就非凡,影响广远。

为了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六十年,纪念已经仙去的历史学家,我们编选了这本《上海史学家印象记》,收录徐森玉、吕思勉、顾颉刚、陈守实、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李亚农、戴家祥、李平心、苏渊雷、魏建猷、谭其骧、胡道静、吴泽、张家驹、杨宽、程应镠、田汝康、陈旭麓、方诗铭、杨廷福、唐振常、李华兴、朱维铮等二十五位生前主要活动在上海的历史学家的纪念与回忆文章。鉴于世界史已为一级学科,已有独立的世界史学会,故本书对于教学、研究领域主要为世界史的学者未收。

这二十五位史学家生前工作单位分别为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与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的文章按传主出生年代为序,出生年份相同的,以逝世年份为序。记述同一传主的文章,以作者年齿为序。

2002年,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时,曾出版《史魂——上海十大史学

家》，书中收录上海十大史学家的学术传记，包括李亚龙、吕思勉、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陈旭麓、程应镠、谭其骧与魏建猷，偏重于传主史学方面的贡献。本书可作为其书的姊妹篇，偏重于传主的生平与为人处世方面，收录范围也更为广泛。

上海市历史学会

2012 年 11 月

目 录

- 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 牟润孙 / 1
- 功绩与精神永存——徐森玉和西北科学考察团 徐文堪 / 4
- 书生报国——徐森玉和郑振铎抗战期间抢救珍贵图书的隐秘活动 陈福康 / 8
- 全凭溪水想音容——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陈燮君 / 19
- 徐森玉古籍整理事略 王 菡 / 25
- 吕思勉的史学观 张耕华 / 32
- 记吕思勉先生的几则逸事 朱伟明 / 39
- 严师守老 王春瑜 / 47
-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王学典 / 49
- 春风中的烈焰——记历史学家周予同教授 廖 梅 / 56
- 忆周谷老 姜义华 / 62
- 百岁华诞出奇迹——记从副校长岗位退下后的蔡尚思 傅德华 / 65
- 我的父亲李亚农 李小骝口述 樊波成采访、整理 / 71
-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记古文字学家戴家祥教授 郭国义 / 84
- 李平心的史家风骨 胡逢祥 / 94
- 钵水居士苏渊雷 房鑫亮 / 114
- 君子如玉——苏渊雷先生怀想 陈丽菲 / 125
- 风雨八十载 心血付汗青——中国近代史专家魏建猷先生传稿 周育民 / 133
- 谭其骧传 葛剑雄 / 155
- 相忘于江湖——忆道静 钱伯城 / 179

坚忍不拔,为学术贡献一生——纪念上海史研究开创者胡道静 邹逸麟 / 181

师恩长忆话当年——我与道静先生的师生情谊 虞信棠 / 183

以古文献整理硕果建历史学研究丰碑

——记科技史、古农史、上海史家胡道静 虞信棠 / 185

永远的缅怀——怀念父亲胡道静 胡亚楣 / 205

迁澜斋纪事——吴泽先生的几个侧面 王东 / 207

尚余春梦足清谈——写在《张家驹史学文存》之外 虞云国 / 219

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

——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虞云国 / 226

杨宽先生与《从传说中的夏图》到《夏时期全图》 钱林书 / 233

流金的书与人——程应镠先生《流金集》读后 虞云国 / 237

一代学人的三大贡献——记田汝康教授的非凡学术生涯 傅德华 / 247

怀旭麓 冯契 / 256

无尽思念献恩师——陈旭麓老师十年祭 郑云山 / 258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陈旭麓先生 熊月之 / 263

忆陈师旭麓先生 茅海建 / 269

方诗铭先生传记及其学术研究评述 方小芬 / 276

回忆先师杨廷福先生

——纪念杨廷福先生诞辰八十周年,逝世二十周年 陈丽菲 / 290

唐振常先生印象记 熊月之 / 295

侠儒唐振常 吴健熙 / 302

1989—1991:关于恩师李华兴教授的记忆拼图 王冷一 / 320

贯通于周秦、晚清之间:悼念朱维铮教授 姚大力 / 332

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

牟润孙



晚年徐森玉(1965年摄于上海)

轻富贵易,轻没世之名难。山林枯槁寂寞之士,尽亦有置没世之名于不顾者;特其人多孤芳自赏,不与世同休戚,斯孔子有鸟兽不可与同群之叹也。旷观今日士夫,莫不以富贵为趋,以声华相逐;由是以害群毒类,亦悍然安忍为之;世变之酷,殆根于此。顾其中有一人焉,和其光,同其尘,涅而不缁,皓皓乎超富贵声华而上之,勤勤焉,恳恳焉,唯以淑世为心,则吴兴徐先生森玉是矣。

先生受业于式枚晦若先生之门,贯通经史,尤工骈俪,学至精博,而谦抑珍秘,不轻示人。润孙可得而言者,约有三焉:

先生深于录略之学,论历代典籍传写雕印之源流沿革,如数家珍,造诣所极,冠绝海内。京师、北平、东方、中央、上海各馆之设立,搜集采访,都先生任之,以故华夏藏书于兵火外流之余,犹得保存劫灰于万一。今之司典籍、言版本能略窥门径者,溯其师承,尽皆渊源于先生。即南北诸藏书家商榷质疑者,亦踵相接也。先生未著书言版本,且未手编目录,悉以其所知者启迪后学,助人撰述,此其一也。

近人重考古,更好言艺术,殷周铜器、古物字画以及碑版石刻,论之者多矣,而

言及鉴别真伪、考订年代，群敛手推先生为祭酒。论者聚讼莫决之事，往往得其一言而解。平生所得，悉奉之于公，痛绝巧取豪夺以自肥之行，一室萧然，无奇书古物之私蓄，如世流名士之所为者，此其二也。

法相宗自玄奘窥基而后，中土久绝嗣响。先生中年皈依三宝，精研唯识，建三时学会以居之。公退之暇，茹素研诵，探隐索奥，湛密圆融，韩居士德清，备加推许，以为举世无两。先生则深藏若虚，未见其笔之于书，从不闻其为人说法，此其三也。

至于光宣以降，民国而后，政潮起伏关键，文物散佚存废轶闻，先生之所亲历目睹者，润孙尝侍坐左右，获闻其一二，率为未曾传世之秘辛。惜乎先生淡泊自甘，忘情述作，有人欲笔录之，因循迁延，终成虚愿。果能形诸楮墨，则徐一士、刘禹生辈与夫今日谈掌故者流，岂能望其项背哉？先生好奖掖后进，人有一善之长，称誉不绝于口。值请益问难者，又未尝不谆谆反复详告之。承学之士，无问耆硕后进，咸衷心悦服而喜与之游；虽其人政见有左右之歧异，思想有缓急之错出，先生旷怀远韵，泯其异同，唯与之以学问相期，以肝胆相照而已。

先生自民初官教育部佥事，历充图书馆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副院长诸职。屡有升晋之机，谦逊退让，避首长而不为，虽当轴敦促殷殷，辄婉言谢绝。日唯布衣，出则徒行，间或乘公共市车。名位已通显而自奉俭约，无异于寒素。处世和易，不与人忤，宽以待下，亦未尝阿谀取容于权贵。性最嗜游，足迹遍天下名山，东南西北，殆无不至者。华、岱、衡、嵩、盘、黄、匡庐、雁荡，既皆登绝顶、攀悬壁。东北之长白，西南之点苍，亦皆亲履其地。游迹之广，徐霞客犹未能及之焉。北平西山大觉寺侧，有鹫峰寺，数百年旧迹也，日就颓废，先生爱其广旷，为之修葺，金碧辉煌，山水顿然生色。讼师某见而涎之，夺以为别墅，先生默然，绝不语其事。其访求文物也，偶有见，则必力图所以保护流传之道，以公诸世。《磬砂藏》之影印，《赵城藏》之发现，世备知之矣。七七变后，居延汉简遗于北平某地，日寇索之急，先生浼沈君仲章设奇计以出之，秘运至香港，辗转移存于美，今始归赵，日人始终不知也。今人多能居延汉简考释，而孰知其中所历之艰险哉？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今日典守古物图书诸长史，当犹有能言之者。世有良史，将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也必矣。

民国五十九年岁次庚戌，夏历七月二十三日，为先生九十悬弧之辰。润孙早年

追陪杖履,得闻训诲。在沪时,以避兵火托庇宇下,先生视润孙宛如子弟焉。哲嗣伯郊,能传其版本古物之学,与润孙时相过从。两世交契,今日竟不克抠衣登堂,申颂祝于万一,瞻望云天,怅恨无已。谨陈其隐德奇行以为先生寿,惜润孙之所能知者,犹浅鲜也。知雄守雌,为而不有,方之古人,盖诚有得于柱下史之传者也,先生之德其犹龙乎。

愚晚牟润孙顿首拜祝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功绩与精神永存

——徐森玉和西北科学考察团

徐文堪

今年是家父徐森玉(鸿宝,1881—1971)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和逝世四十周年。他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曾经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参与考察团的各项工作。此事知者不多,现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资料,作一简单的介绍,以此缅怀为中国和世界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中外先贤。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国近代首次由中外学者联合组建,规模大、学科多的学术考察团体。1926年,最早“发现”楼兰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再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考察活动从一开始就遇到麻烦,中国西部已经不再是可以自由穿行的无人之境,而赫定的对手,也是后来的合作者,乃是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尽管开始之时双方缺乏共识,中国学术界内部也存在矛盾,但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刘复(半农,1891—1934)等中国学者在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表现出灵活的态度,终使中瑞双方达成协议,共同组建考察团。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徐森玉偕周肇祥(1880—1954)去车站送行。周是家父老友,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京师大学堂、法政学校毕业;工诗文书画,历任湖南省省长、临时参议会参政、清史馆提调、中国画研究会会长、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在所长任内,和刘复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赫定签约。

考察团中方团长为徐炳昶(旭生,1888—1976)。徐先生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所所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著《中国古史

的传说时代》曾产生很大影响。他也是家父多年好友。

参与和领导考察团工作的袁复礼(1893—1987)留学美国,是中国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他在考察途中发现大批爬行动物化石,获瑞典皇家科学院“北极星奖章”。袁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起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从事地学教育六十多年,培育了几代地质人才,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中,有29位出自其门下!他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一起进行“仰韶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2011年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周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仰韶村竖立了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安志敏四位先生的铜像。袁先生同样是家父多年挚友,记得我读中学时,在家中看到他亲笔题赠家父的英文著作。

在考察团中从事考古工作的黄文弼(1893—1966)与家父有数十年交谊。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起,他为中国新疆和西北各地的考古事业作出了毕生努力,著有《高昌陶集》(1934年)、《高昌砖集》(1951年增订)、《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1958年)、《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年)、《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1983年)、《西北史地论丛》(1981年)、《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1989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90年)等。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他都曾亲笔题赠家父。

考察团于1928年2月到达乌鲁木齐。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有:袁复礼和瑞典学者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内蒙各地采集细石器,在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等地采集新石器时代遗物。1930年贝格曼从4月份开始陆续于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万余枚,此即“居延汉简”。贝格曼和黄文弼都在新疆进行了重要的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工作。除考古学外,中瑞双方有地质、气象、天文、生物、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专家参加考察。外方队员除瑞典人外,还有来自德国、丹麦、俄国和爱沙尼亚等国学人。实地考察持续至1935年,后分头撰写考察报告。从1937年起,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瑞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专书已达56种。

当年参加考察的中国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多为一时之选,日后都有杰出成就。考察地点遍于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虽然环境艰苦,但皆不辱使命,收获甚丰。如地质学家丁道衡(1899—1955)于1927年7月3日发现白云鄂博铁矿,

后来的包钢就是在其发现的基础上建立的。鉴于丁先生的巨大贡献,包钢特为其塑造铜像作为永久纪念。又如陈宗器(1898—1960),是中方当时在西北地区考察、工作时间最长的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乃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他与赫定友谊深厚,有一百多封来往信件,现存瑞典国家档案馆。刘衍淮(1907—1982)是著名气象学家,1949年后去台湾,继续从事气象教学和研究工作,后任台湾师大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就的文章。另一位气象学家徐近之(1908—1982),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在历史气候学和灾害防治方面贡献突出。与考察团有紧密联系的科学界、文化界知名人士,除家父外,有蔡元培、胡适、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马衡、梅贻琦、沈兼士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家父本已离开北平,因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仍陷于敌占区,于是在11月潜回北平,与北大助教、西北科学考察团干事沈仲章将汉简设法运出,后经天津、青岛,辗转入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沈先生生于1905年,2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后为刘半农弟子。其人多才多艺,不仅通晓数种外语,而且在语言学(1934年6月曾在刘复率领下与白涤洲、周殿福等同往包头进行方言调查)、录音技术、摄影、医药等方面都有深厚造诣,特别是在发掘和整理民族音乐遗产方面贡献良多。沈先生是家父后辈,却也是终生好友。他倒有一桩轶事广为人知:著名翻译家傅雷(1908—1966)在1966年9月2日深夜的绝笔中记有:“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据沈仲章先生回忆,当时除将木简冒险运至家父住处外,还把一些考察团的主要物件一起运出,如居延笔的模型(复制品)、贝格曼发掘居延汉简的地形坑位草图、邮局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发行的纪念邮票和许多原始记录、账目等等。其中盛放居延笔复制品的木盒上的题字便是家父的手书。

上述与居延汉简相关的原始文件未随汉简运往美国,至今仍收藏在香港大学,现名“居延汉简整理文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邢义田先生曾于2007年11月25日至29日到港大作了一次专门调查,归后撰有长文《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居延汉简整理文件调查记》,载于史语所出版的刊物《古今论衡》第20期(2009年12月)。文中收录了考察团理事会及木简整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家父作为常务理事始

终与会。如1935年2月25日于团城召开第六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由袁复礼任主席,记录为沈仲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主席报告赫定、那林(Erik Norin)正式担保于一定年限内归回古生物及考古采集品公函内容,徐森玉、陈受颐两理事提请本会正式通过赫定、那林担保函。无异议通过。并议决:该函所附详单俟检验完毕后,由本团在平全体常务理事及本案关系方面代表负责签名。这份清单原件也保存完好,清单最后有1935年3月27日陈受颐、胡适、董作宾、王作宾和家父的中文签名与用印。另有赫定、那林、袁同礼和傅斯年的西文签名。袁同礼(1895—1965)为袁复礼之弟,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也是家父的老友和同事。

邢义田先生在文章最后指出:这次有机会亲见港大所藏居延汉简初步整理留下的工作记录,益发深信这万余木简能有今天的命运,实在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当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诸位先生的无私奉献感人至深,正如《人民日报》在1987年为纪念考察团成立六十周年发表的长文的标题所说,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

(作者为《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

书生报国

——徐森玉和郑振铎抗战期间抢救珍贵图书的 隐秘活动

陈福康

一

徐森玉(1881—1971),今人未必皆知他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他与鲁迅同龄,又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今年(2011年)8月,是他130岁诞辰。徐森玉比著名学者郑振铎(1898—1958)长17岁,比郑振铎父亲年龄只小三个月。郑振铎与徐森玉“忘年之交”,两人不仅在学术上有太多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经历过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火的考验的,是可歌可泣的。可惜的是,他们间的动人的友情故事如今知道的人也很少。近日我去台湾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等人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秘密抢救珍贵图书的老档案,极欣喜地发现了一些有关郑振铎与徐森玉的新资料。现在我就写写郑振铎与徐森玉的故事,以作为对这两位老前辈的纪念,尤其是作为献给森玉老130岁诞辰的一瓣心香。

民国初年,徐森玉就在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处工作,估计20年代郑振铎就和他认识。但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今看1933年朱自清日记,8月,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金代刻本藏经卷子,郑振铎就是在徐森玉处得知消息并见到部分经卷的。当时郑振铎兴奋异常,认为“可惊动一世之耳目,或当有类于敦煌宝库的发见”(郑振铎:《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1934年,郑振铎编印《清人杂剧二集》时,在《题记》中还特别感谢了徐森玉对他的帮助。可知30

年代他们已经很熟了。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被任命为国家的第一任文物局局长,总负责全国的文物和博物馆、图书馆工作。郑振铎曾热情动员徐森玉到文物局担任重要职务,还亲自为徐布置了办公室,特地安排了贵重的紫檀木写字台和坐椅,虚席以待。可惜徐森玉因故不能离开上海。徐森玉被任命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来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这当然也与郑振铎的推举有关。郑振铎几乎每年都要请徐森玉到北京去,以便当面请教。而他到上海时,更少不了去拜访。郑振铎还反复叮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唐弢,要他好好向森老学习。徐森玉长子徐伯郊,在香港的广东银行当经理,因从小受父亲熏陶,对古籍、字画亦颇有鉴赏眼力,50年代成了郑振铎在香港为国家秘密收购文物书籍的重要帮手。徐森玉的女婿、诗人王辛笛,早在30年代就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的部下和文学界友好。因此,郑振铎与徐森玉两代都有深交。

1958年10月16日,徐森玉出差到北京,郑振铎亲自去车站迎接,陪他到故宫招待所下榻,谈了很多话,还热情地请他到家里吃了晚饭。第二天郑振铎就率团出国,不幸竟因飞机失事而长逝!悲痛万分的徐森玉就北京参加了郑振铎的治丧活动,为治丧委员会委员。

郑振铎与徐森玉长达三十年的友谊中,最感人的一段是在抗日战争年代。也正是这一段交往,使他们互相最深刻地了解了对方,成为真正的生死道义之交。

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曾与许地山、瞿世英、林语堂、马鉴、马衡、袁同礼、汤用彤、贺麟、简又文等人一起发起“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于12月4日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这一重要的文献,如今也不为人所知)。在宣言上署名的20人中就有徐森玉。该宣言后经香港新闻检查当局删节,登载于5日香港《大众日报》上。对郑振铎和徐森玉来说,真正的生死考验关头来临了。

当时,郑振铎坚持战斗在上海,目睹江南一带的珍贵古籍文献大量散佚、毁坏和被日伪及美国有关机构买去,心急如焚,便于1940年初与在沪的著名文化界上

层人士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争取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他们将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秘密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毁灭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其意义特别伟大和悲壮!

“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了近一年,重庆方面特派徐森玉冒险潜往上海,秘密参与验收和抢救工作。今见 1940 年 12 月 18 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写道:“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从此,郑振铎便与徐森玉几乎日夕相处,并肩战斗。

例如,12 月 20 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即提及“森玉先生来,谈及渝方将开会,索购书之约略统计;兹以二日之力,略加计算,拟就一电”。这个电文于 23 日由郑振铎化名“犀谿”(从其笔名“西谿”来)、张咏霓化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化名“如茂”(从“松”字来),联名发给在重庆的央图负责人(当时尚未正式任命为馆长)蒋复璁,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第一句话就是:“森公已到,谈甚畅。”又说:“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卅种,元本七十种,明本千余种,名人抄本八百种,未刊稿本三十余种,密藏孤本不少,其他普通应用书为数更多……共用款约四十二万。”这封电文今犹存于台湾的“国家图书馆”。12 月 21 日中午,徐、何、张三人还应约至郑家午餐,研究问题。23 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提到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当即由森玉先生及我共同签字贴封为凭”。徐森玉还与郑振铎一起去嘉业堂刘宅、中国书店金宅等处鉴定和挑选图书。1941 年 1 月 16 日,徐森玉请郑振铎、张咏霓、何炳松到他家午餐,并商议如何将书运出等事。

一个月后,徐森玉充分了解和体验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特别是郑振铎的艰苦忘我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 1 月 20 日致蒋复璁信,表彰郑振铎等人为国家抢救文献,“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2 月 20 日,何炳松致蒋复璁信说:“此间事实奔走最力者,当推西谿兄(按,即郑振铎)。而版本价格之审定则咏老最称负责。自森公驾临后,日夕与西谿兄商讨新本,检点旧藏,逐书经眼盖章,劳苦功高,同人极